

目 录

凌源城的三次解放	解方 邵年 (1)
忆解放初期的干部学习	解方 邵年 (3)
解放初期的凌源中学与热辽中学	李铭三 (7)
解放初凌源城的小学教育	解方 邵年 (17)
郑恩同志回忆录	(2)
解放战争中一支回民武装	
——记凌源回民大队	解方 邵年 (31)
奔向光明	
——记在凌源起义的韩梅村将军	解方 邵年 (56)
齐心共济，风雨同舟	
——凌源县解放初期与我党合作	
共事的几位政协委员小记	政协凌源县委员会办公室
	整理 (45)
张英华回凌诗十首	(55)

凌源城的三次解放

解方 郤华

位于关内外通行要道上的凌源城，历来是联结关内外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凌源人民，勤劳朴实，酷爱和平。在中国现代史上，共产党领导八路军、解放军，浴血奋战，三次解放凌源，凌源人民方得以彻底翻身解放，当家做了主人。至今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抚今追昔，感慨油生。

凌源城的第一次解放，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九四五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疯狂的侵华战争，继侵占了我的东三省之后，一九三三年又侵占了我热河省，凌源城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沦陷。在日伪的血腥统治下，惨寇肆虐，敌伪为奸，山城凌源人民遭殃，生灵涂炭，整整过了长达十二年的亡国奴生活。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甘屈辱，奋起反抗，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奋战在冀热辽大地上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迅速解放了凌源城，摧毁了敌伪政权，相继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建立了凌源县人民民主政权。

凌源城的第二次解放，是在解放战争中的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下了峨眉山，抢摘人民胜利果实，大举进攻解放区，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民党的中央军侵占了凌源城，凌源人民再一次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的胜利，原国民党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少将司令韩梅村，在中国共产党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要民主的政策感召下，毅然率部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起义。为了接应韩梅村将军的起义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解放了凌源城，使韩梅村将军的起义顺利实现，旋即撤离。这次凌源城的解放，虽然仅仅只有一天，但震慑了敌人，给人民带来了希望。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农历五月初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又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解放了凌源城。这是凌源城的第三次解放，也是彻底的解放。在战斗中，国民党反动派的军警部队大部被歼，少数逃窜，敌党政机关全部摧毁，一九四五年建立的人民政权重新恢复。从此，凌源全境全部解放。

从那时起，历史之树已增加了四十周年轮。四十年来，凌源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奋发图强，改造山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致富家乡，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昔日贫困落后的凌源而今欣欣向荣，旧貌换新颜。在纪念凌源全境解放四十周年之际，纵思回顾，心潮澎湃，缅怀先烈，更添崇敬，展望未来，壮志倍增。我们一定要继续干下去，把凌源的事情办得更好！

忆解放初期的干部学习

解方 郅年

今年六月二十一日是凌源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日。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县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四十年里，有无数可资回忆的壮丽事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众多往事中对我们启迪最大、教育最深，在记忆中永不磨灭的要数解放初期的干部学习情况了。

记得一九四七年六月凌源县城第二次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获得解放，恢复了已在一九四五年就建立的人民政权。党在凌源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了县城内。巩固政权，支援战争，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开办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都摆上了工作日程。真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众多事业需要人去办，需要组织领导，需要干部。于是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就从翻了身的农民中，从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一批干部，还从旧社会遗留下的公职人员中留用了一些教员、职员和营业员。这些人参加革命工作的目的和动机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是为着保卫翻身后分得的胜利果实而来的；有的是为着跟着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而来的；也有的是为着找“差事”而来的。目的不一，思想各异，旧的观念很浓厚。既没全部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不懂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不适应新社会、新任务、新要求需要。为了把这样一些人培养、教育成为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和政府的干部，不仅要加强政策教育、工作方法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进行转变世界观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之适应新的社会、新的任务、新

的要求。在政治思想教育中除把干部分期分别送党训班、干训班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外，主要靠组织干部日常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学习解决。以单位为主，每晚组织干部学习，或阅读文件和书报，或进行讨论。每周有一次统一辅导，由县和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做报告或解答问题。当时电灯还很少，多是靠油灯、腊烛或石灯照明，条件艰苦，但人民学习兴趣很浓。开始学习了《土地法大纲》及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接着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读本》，建国前夕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华社的几评美国《白皮书》《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献材料。通过学习，新干部逐步了解了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了解了当时进行的反内战、反独裁，打倒蒋介石政权，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意义。通过学习，新干部逐渐转变了旧观念，初步树立了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当时，在学习时采取了敞开思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办法，通过讨论，提高思想，统一认识。提倡互相提出问题，互相答辨。领导采取循循善导的办法，弄通道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开始，学习《土地法大纲》，一九三三年关于农村划分阶级成份的两个文件，遇到的问题是怎样理解阶级和怎样划分阶级。讨论中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认为阶级就是官大官小，谁官大谁的阶级。

~ 4 ~

就大。这是误把军队的军衔中的“阶级”，套在了社会阶级上，也有人把社会职业说成是阶级，说开工厂，做工的是工人阶级，农村种地的是农民阶级，开商店做买卖的是资产阶级。在怎样划分阶级上，有人认为依钱多钱少划，有人认为依人多人少划。经过学习最后统一了认识，认识到社会上的阶级是对立的，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区分，同是在农村种地的人中，有占有土地剥削别人的地主、富农，有没有土地给地主扛活倒月，受到剥削的雇农、贫农。划分阶级要以雇拥劳动多少、剥削量大小和被剥削程度来确定。这时比较正确的理解了《土地法大纲》，掌握了党的政策。在学习《社会发展简史》时围绕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人类历史，展开了讨论。开始不少人对人类祖先是类人猿进化来的观点接受不了，对历史地观英雄，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莫说不一；对中国是走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道路，也模棱两可。通过学习《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澄清了模糊认识，统一了思想，初步树立了唯物史观，树立了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信念。通过学习，人们了解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工作，不是干官事、做官当老爷，而是要为人民办事，当人民的勤务员，对人民群众不能打骂，也不能发态度，不能贪污受贿，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回忆这一时期的学习，为什么对人的教育这么深？一起从旧社会来的这一批人，要担负起建设新社会的任务，首先观念上要更

新，需要懂得新的观念、新的政策、新的方法。因此，本人有学习的要求和紧迫感，对学习如饥似渴，所以起早贪黑，披星戴月的学，对学的东西一定要弄明白。二是有比较好的学习方法，每个人都阅读文件、书报，都独立思考，并开展自己讨论，一人提出问题，大家辩论剖析，各抒己见，互相补充，以探讨真理，明辨是非。三是组织领导者循循善诱，耐心疏导。正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和形势下，人们的思想潜移默化，有了很大的进步，抛弃了旧思想、旧观念，换上了新思想、新观念，使世界观逐步发生了转变，造就了一批干部，使得一代人跟上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跟着党和人民一起前进。

解放战争初期的凌源中学与热辽中学

李 第 三

(一) 凌源二次解放后的凌源中学

1947年5月间，凌源第二次解放后，热东地委决定，由我在凌源中学校长。我于1947年7月到校。

原来国民党时期的校长李某，二次解放时，跟随国民党逃跑了。教职员也有跑的，也有二次解放后未来校报到的。我到校时，原有人员，继续留校工作者有：副校长王某（凌源人），数学教师刘杰（喀左大城子人，因他长于代数，人皆称之为代数刘），语文教师丁政达（已故，凌源人，回民），语文教师代言（喀左大城子人，不久，他参加了热东话剧团，离校），英文教师张天民（后改名张平民，盖县熊岳人），地理教师刘洪坤（喀左大城子人），体育教师焦东，会计张振芳，事务李某，共计九人。

原有学生二、三百名，那时继续在校学习者，只有一百二、三十名。师、生所以减少之原因：主要是大家过去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的各种主张和政策不了解，顾虑多端，怕这怕那，不敢来校。特别是有些家长，唯恐自己的子女被共产党逼迫去当八路军。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学校只能开三个班：初一、初二、初三各一班。高中班因学生太少，未能开课。就这样勉强上课。约三、四个月。

1947年冬，解放区轰轰烈烈地进行土地改革，后来人们称之为“大风暴”。组织上决定：学校停课，全体师生下农村参加土改。我认真地作了动员，自愿参加。结果只去了两位教师，刘杰与刘洪坤，还有会计张振芳，他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去不行，学生六十名左右，其中有女生六、七人。去的人都是家庭成份比较好，没有什么问题，胆子比较大的。下农村搞土改，是由我带队。

我们约于1947年12月初，到凌源以西宋杖子一带参加土改。其实他们下去作不了什么工作，只是写写标语，贴贴标语，作一点宣传工作而已。主要的目的，是让他们下去受教育。现在看来，教育意义也并不大，那些过“左”的作法，不得人心，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并不佳。还不如让他们在学校受教育为好。

这一时期，师生的待遇问题：学生都是凌源人，完全自费，但土改期间，在农村吃派饭，等于公家供给，我是供给制，连津贴费也没有，其他教、职员也无工资，而是每月酌情补助小米若干斤。

（二）凌源中学与热辽中学合并

我们在宋杖子搞土改两个月左右，约于1948年1月末，忽接热东地委的指示：凌源中学合并于热辽中学，要求我把这部份参加土改的师生，全部带到建昌去，那时热东地委在建昌，热辽中学也在建昌。

为何两校要合并？为何马上要求把这部分师生全部带到建昌去？我当时真是莫明其妙。莫非当时局紧张，怕这些师生在此遭损失？

事后了解并非如此。而是有些领导同志想法拙劣。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把这批学生弄到建昌去，加以短期培养，成为我们的干部。这本来是件好事情，但却几乎弄巧成拙。参加革命，应当自愿，不能强迫。

我们约于1948年2月10日左右（春节之前），大家坐胶皮大车到达建昌。地委宣传部长刘兰生同志对我讲：“……热辽中学不放寒假，所以凌源中学的学生也不能放寒假。不能让他们回家过春节……”。我想这不是个办法，他们有腿会逃跑的。青年学生对过春节的观念很深，不让他们回去过年，这怎么能行呢？不但学生们自己思想不通，就是学生家长也一定会有意见，产生顾虑，影响不好。经我再三要求，而且保证把他们再全部带回来，刘部长才答应让他们回凌源过春节，过了元宵节再回来。

（三）春节期间组织学生扭秧歌，轰动了凌源县城，鼓舞了学生，稳定了学生们的情绪。

学生们听说让他们回家过春节，大家都很高兴。我也同他们一起回了凌源。刘杰老师也回去了。刘洪坤老师因为在伪满时，当过伪村长，地委认为他有问题，留在地委进行审查。他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又把他放了。以后听说他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又请他回校当教师。这是后话。

回到凌源，我就组织学生们扭秧歌。我自己编写了一些小调，是根据我在延安时听到的一些小调，回忆、改写或另写的新词。

如“春秧曲”：“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我呀今年收成好，多打些五谷充军粮”！另一段：“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种瓜得瓜呀，种豆的收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纺棉花”：“小小的纺车儿呜呜地转，雪白的棉花纺呀纺成了线，纺成了线来，织成了布，做成了衣衫大家有衣穿”！另外，写了些数来宝、说快板等。我亲自教学生们唱。刘杰老师好拉胡琴，他就琢磨着伴奏。因为我不会作曲，也没有谱子。

演出时，我亲自带队，亲自指挥。我们的秧歌队虽然办的质量很差，扭的不好，（因我自己不会扭，也不会教），唱的也不佳，主要是时间短促，台词背的不熟，但却轰动了整个凌源镇。因为是新鲜事物，大家都喜欢看。这样一来，大大地鼓舞了学生，学生们都喜欢接近我了。

秧歌扭过了，我就开始动员学生回建昌。普遍地进行家访，一个一个地进行动员。但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去了四十多名男生，女生是一个也没去。有不少的学生本人愿意去，就是家长坚决不让，就怕自己的孩子去当了八路军，这也不能强迫。我对刘部长的保证，未能完全实现，这也实在没有办法。可是如果不是组织学生们扭秧歌，恐怕连这四十多个学生也去不了。那时国民党与我们争夺青年学生颇为剧烈。据我所知，跟我下乡搞土改的那批学生，春节之后，未去建昌者，以及凌源二次解放后未复学者，有不少的学生跑到天津或北京去了，有的还参加了“三青团”。

~10~

四热辽中学的组织机构

热辽中学大约是1946年6、7月间创办的。原计划大量吸收地方上的青年学生，加以短期培训，成为地方干部。故特策略地称热辽中学，而不称热辽干部学校。但当时局势不稳，加以当地的老百姓对共产党的认识不够，招收学生极为困难。所以首先从地方上抽调一批青年干部，成立地方干部训练班，加以短期培训。

热辽中学无固定校址，无固定校舍，而是到哪里，就在哪里借用民房。

凌源中学合并过来之后，才算是真正有中学生了。故特成立中学部，又增加了个师范部，加上原有的地干班，共有三个组成部分。

校长——热辽专员仇友文（已故）兼任。

副校长——陈少轩

教导主任——江东

中学部主任——李第三

师范部主任——肖红聚

地干班主任——苏确

总务处长——张海风

地干班的学生，人数不定，时多时少，师范部的学员不多，只有二、三十名，中学部的学生比较多，其中凌源中学学生四十

多名，在辽阳当地招了十名左右，又从地干班选了十名左右文化低的干部（内有女生五、六名）共计学生六十多名。

热辽中学的专职教员，只有刘杰老师一人。师范部和地干班均无专职教师。地干班主要由陈梦轩与苏确二同志上课，师范都是肖红骚同志一个人顶着，中学部因为教师少，所以只能因人设课。刘杰老师教数学，我教政治、语文及地理，根据这样的条件，所以只能开一个班。

（五）关于中学部教学方针的争论

副校长陈梦轩和教导主任江东二同志的意见是：我们的目的是在短期内，将这些青年学生培养成我们的干部。所以教学内容只能是不定期地讲一些党的方针政策，主要的是让他们劳动改造思想，不上文化课，思想改造不好，学文化课也无用。……我则极力反对这种办法。我认为：如果光叫学生们一天家劳动，而不上文化课，学生们的情绪一定不会稳定，必然会发生逃跑的现象。他们会这样想：如其在学校里一天竟劳动，还不如回家帮助父母干活呢！我是力主上文化课。不上文化课，则名不符实。至少每日半天上文化课，半天劳动。上政治课讲党的方针政策，结合实际改造思想，才能有效地把这些青年学生培养成我们的干部……。我们几个人，开了多次会。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最后还是照我的意见办了，每日上午上文化课，下午劳动半天，就是这样。还跑了几个学生。

坚持上文化课的时间不长，学生们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了。接

着情况大为好转。几个月后，学生个个努力学习，积极劳动，思想上要求进步，争取入团。

（六）凡事开头难

那时办学可真不容易呀！真是困难重重，上面无任何指示，没有一定的章程，校舍、教具完全没有，理化仪器及图书，更谈不上。而最大的问题是既无课本，又无任何参考书籍。编写教材，全凭个人的记忆。真是太困难了。像刘杰老师是位老教师，问题还不大，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教师，就难上加难了。政治课还好说，语文课，我找到一本阿Q正传，算是救了命，地理课呢，我上大学时，是学地理的，就给学生讲自然地理。诸如“银河系”、“太阳系九大行星”、“地球的形成”、“造山作用”、“火山的成因”、“地震是怎样发生的”、“温泉是怎样形成的”、“一年四季的成因”、“日食与月食”、“潮汐的成因”、“风、雨、雷、电的成因”、“降雨的类型”、“沙漠的成因”等等，想到什么讲什么，根本未考虑学生当时的程度能否接受得了，能否听得懂，效果如何。但是学生个个细心听讲，很认真地作笔记。

到1948年7月，这班学生在热辽中学学习了半年，成绩颇佳。文化课学的很好，而最突出的是思想上的进步。有许多学生入了团（那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新成立的，以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大家自觉地遵守纪律，什么问题也未发生，互相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情况喜人。

这一时期，师生的待遇问题，学生的待遇：吃饭是公家供给（那时粮食困难，所以常用野菜煮粥吃），服装自备，但我记得给学生发过鞋子和手巾等；教职员都是供给制，带家属困家属不工作者也跟着享受供给制。刘杰老师未带家属，而是每月补助小米若干斤。

(七)热辽中学搬回凌源中学原处，又改名凌源中学

1948年8月，学校搬回凌源，改名凌源中学，后又改为热河第二中学（按成立先后，赤峰中学为一中，承德中学为三中，朝阳中学为四中），地干班与师范部都取消了。

校长——陈梦轩

教导主任——李铭三（原为江东，不久他调走了）

总务负责人——刘长胜

学生骤增至三百多名，（男女兼收）分八、九个班，高中班也开了课，成为一处比较正规化的完全中学。

教师也大为增加，原来凌源中学的刘洪坤与张平民二位老师都回来了（原副校长王某、体育教师焦某、事务李某都未回来。会计张振芳1948年2月，在热辽中学交代完帐目之后，不愿留热辽中学工作，回凌源（家）了——参加革命工作要自愿，不能勉强——他以后跑到北京去了，据说还参加了“三青团”）。我们又在凌源镇聘请了几位老师，不久，从北京来了四位大学生：冯大民（已故）、裴铎、何介与周树奇，他们是在北京学生反饥饿运动中，通过北京地下党，跑出来的。这几位教师，后来成为教师中的骨干分子。从热辽中学回来的那班学生成为学生中的骨干分子。这班学生原来文化程度不齐，

根据各人的文化程度，尽量分派到各个班里，担任班干部或班委会的干部。

这一时期，师、生的待遇问题：交派的学生，完全自给；从地干班来的学生，仍然是供给制；从建昌来的学生，根据家庭情况，困难者酌情给予补助。一般的教师仍无工资，而是每月酌情给予补助小米若干斤，职员及由北京来的那四名大学生，则是供给制。

（四）大好形势鼓舞全体师、生

那时形势真是太好了，局势发展的非常之快！1948年9月锦州解放，接着10月长春解放，11月初沈阳解放。而每解放一个大城市或中等城市，我们二中学生都扭秧歌庆祝。而每次扭秧歌，都是我亲自带队，亲自指挥。

在庆祝沈阳解放时，我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红军大反攻时，在延安听到的“庆祝苏联红军大反攻歌”，其内容是：“锣鼓响，鞭炮鸣，苏联红军大反攻！昨天收复一个镇，今天收复一座城！嗨！嗨！苏联红军大反攻！”略加修改，成为“锣鼓响，鞭炮鸣，人民解放军大反攻！昨天解放一个镇，今天解放一座城，嗨！嗨！人民大反攻！”另一段是：“……昨天解放长春市，今天解放沈阳城！……”晚间时改为：“锣鼓响，灯火明……”，秧歌队集体扭着大合唱，歌声慷慨激昂雄壮，真是歌者观者，闻之沁人心脾，莫不为之异常感奋，莫不为之异常鼓舞。当时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形势，比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红军大反攻的形势，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是昨天解放

几个镇。今天解放几座城。

1948年12月庆祝天津解放时，改为“……今天解放天津市，明天解放北京城！……”。1949年1月，庆祝北京和平解放时，又改为：“……昨天解放天津市，今天解放北京城！……”。

我们的秧歌队，越扭越大（因为学生越来越多），形式越扭越多样化；打霸王鞭、打腰鼓、舞红绸、演小剧、唱歌也越来越多样化；大合唱（秧歌队集体扭着唱）、各种小调、说快板、数来宝、打连花落、风阳花鼓……。

我编写的歌词，通俗易懂。学生们反映：李老师编写的快板、数来宝，合辙压韵，好学好唱又好听。冯大民老师就很佩服我，他说：“你写得又快又好”。

有一次陈梦轩校长，亲自教学生扭秧歌的步伐，他才是真正的内行，他在延安鲁艺学习过，而我乃是外行一个，什么都是乱来一气。

庆祝北京解放时，我在一个快板中写道：“……傅作义将军本是战犯，这一回立了个大功劳！……”事后凌源县委金书记提出：“这个提法欠妥当。”意思是说我错了，不应当歌颂战犯。我却不以为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傅作义将军过去是战犯，但在和平解放北京的过程中，他与我们合作，避免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将功折罪，就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的同志，而不复为战犯矣！

过去我写的歌词，写好之后，即教学生们演唱。连陈梦轩校长